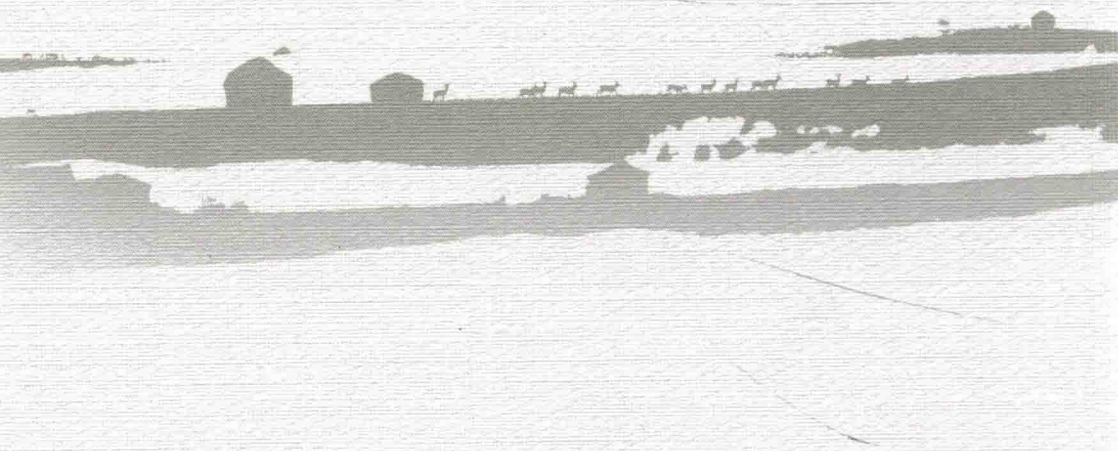




生态人类学丛书 曾少聪 主编

消逝的草原： 一个草原社区的历史、社会与生态

罗 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生态人类学丛书 曾少聪 主编

消逝的草原： 一个草原社区的历史、社会与生态

罗 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消逝的草原：一个草原社区的历史、社会与生态 / 罗意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7

ISBN 978 - 7 - 5203 - 0604 - 1

I. ①消… II. ①罗… III. ①文化人类学—研究 IV. ①C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917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姜阿平
特约编辑 张宇晨
责任校对 胡新芳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5
插 页 2
字 数 371 千字
定 价 9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牧区社会与草原生态	(1)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1)
第二节 学术史的回顾	(4)
一 游牧社会及其变迁的人类学研究	(5)
二 牧区发展与草原退化的研究	(14)
三 “游牧—定居”连续统	(20)
第三节 理论视角：过程生态人类学与政治生态学	(25)
一 过程生态人类学	(25)
二 政治生态学	(30)
第四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34)
一 研究思路	(35)
二 研究方法和田野过程	(36)
三 研究框架	(38)
第二章 吐尔洪盆地	(40)
第一节 生态环境与资源条件	(41)
一 生态环境	(41)
二 农牧业资源条件	(43)
第二节 盆地的族群	(48)
一 哈萨克人	(48)
二 维吾尔人	(55)
三 回汉居民	(56)
第三节 从部落到国家：社会制度的转变	(58)

一	双重制度	(58)
二	双重制度的终结	(63)
第三章	牧与农	(73)
第一节	衰落与重现：牧业的发展与变化	(74)
一	游牧业的生产周期	(74)
二	游牧业的生产组织形式	(82)
三	游牧业的衰落	(90)
四	牧业重现	(95)
第二节	粮仓之路：农业的发展与变化	(98)
一	四十碗塔尔米：早期粗放农业	(98)
二	农业发展的条件	(103)
三	水利与开荒	(106)
四	粮仓之路	(114)
第三节	边缘化：牧业与农业发展的困局	(116)
一	牧业的再次衰落	(116)
二	农业集约化的困局	(124)
三	边缘化困局难破	(127)
第四章	游与居	(129)
第一节	逐水草而居：长腿的毡房	(130)
一	毡房与居住形式	(130)
二	畜粪与燃料	(135)
三	资源利用的其他方面	(137)
四	资源利用的特征	(140)
第二节	美好生活：无脚的房屋	(142)
一	地窝子与土坯房	(142)
二	伐木为柴	(149)
三	木材的社区关系网络	(152)
四	山林消逝	(155)

第五章 顺应与控制	(160)
第一节 顺应自然：游牧民的环境态度	(161)
一 移动性原则	(161)
二 共有产权制度	(164)
三 自然禁忌	(166)
第二节 控制自然：农业的环境态度及其影响	(172)
一 控制自然：农业的环境态度	(172)
二 社区内环境态度的多元化	(174)
第三节 自然禁忌的突破	(179)
一 追根溯源：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被动突破	(179)
二 公地悲剧：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主动突破	(181)
第六章 传统与现代	(187)
第一节 哈萨克游牧民的人口再生产模式	(188)
一 “胡大的旨意”：哈萨克游牧民的人口再生产	(188)
二 驼背上的孕妇：生育风险	(195)
三 制度与观念：生育的社会文化情境	(200)
第二节 人口转型：人口再生产模式的变化	(206)
一 游牧社会的人口转型	(207)
二 人口爆炸：盆地哈萨克族的人口转型	(211)
三 人口积压：婚姻圈与人口流动	(221)
第七章 失衡与调适	(227)
第一节 自然生态失调：盆地生态环境的退化	(228)
一 农田生态系统的退化	(228)
二 山林生态系统的退化	(229)
三 环境风险加剧	(234)
第二节 失衡：人地关系的变化	(237)
一 动态平衡：游牧时期的人地关系	(237)
二 失衡：定居后人地关系的变化	(241)
第三节 调适：发展道路之抉择	(247)

一	两代年轻人的抉择	(247)
二	盆地内的新机遇	(255)
三	燃煤时代	(261)
第八章	移民与盆地	(266)
第一节	迁移之路	(267)
一	迁移的动力与条件	(267)
二	移民的特征与类型	(275)
三	移民的安置	(279)
第二节	移民的生活	(283)
一	集体化时期移民之经济生活	(283)
二	移民经济生活的多元化	(289)
三	移民的社会与文化生活	(298)
第三节	共生：日常生活中的族群关系	(304)
一	经济生产模式与共生关系	(304)
二	共生关系的拓展	(309)
三	族际通婚与边界跨越	(314)
四	族际关系对社区发展的影响	(324)
第九章	结论	(328)
一	社区发展与草原消逝的双重过程	(328)
二	社区发展与生态环境之关系的研究框架	(332)
三	草原社区发展的经验、教训与前瞻	(336)
附录		(339)
参考文献		(347)
后记		(364)

图表目录

图 2—1	田野点在新疆的地理位置	(43)
图 2—2	20 世纪 40 年代吐尔洪盆地资源与部落分布	(44)
图 2—3	阔孜克村村落	(47)
图 2—4	哈萨克部落世系简图	(60)
图 3—1	四季牧场与转场周期	(76)
图 3—2	焦耳巴斯阿乌尔的构成	(83)
图 3—3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且柔奇部落的牲畜占有情况	(87)
图 3—4	盆地小麦与豌豆亩产的变化	(113)
图 3—5	富蕴县和吐尔洪乡历年粮食征购情况 (单位: 千克)	(116)
图 4—1	毡房结构及室内空间布置	(131)
图 4—2	地窝子与两间土坯房的内部空间	(143)
图 4—3	三间土坯房的内部空间	(145)
图 4—4	村民院落的布局	(146)
图 4—5	吐尔洪林区资源分配与利用	(159)
图 5—1	游牧社会的移动性原则示意图	(162)
图 6—1	哈攀及其母亲的生育情况	(189)
图 6—2	游牧社会人口转型的四阶段	(209)
图 6—3	全国哈萨克族和盆地哈萨克族人口的变化情况	(212)
图 6—4	1961—2010 年盆地哈萨克族人口增长情况	(214)
图 6—5	纳比、阿合马丹的家族谱系	(222)
图 6—6	阔孜克村第二代人口的分布与通婚范围	(225)
图 7—1	灾害与牧民的灾害记忆	(235)

图 7—2	吐尔洪盆地村落分化过程	(242)
图 7—3	1985—2012 年富蕴县工业总产值的变化	(251)
图 8—1	盆地移民原籍地情况	(271)
图 8—2	1960 年前后几个主要省份粮食生产形势	(272)
图 8—3	哈萨克族、回族与汉族的经济交换关系	(307)
图 8—4	2012 年富蕴县主要民族的人口规模	(318)
图 9—1	吐尔洪盆地发展与草原消逝关系图	(329)
图 9—2	社区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分析框架	(334)
表 2—1	吐尔洪盆地的植物	(45)
表 2—2	20 世纪 40 年代富蕴县哈萨克部落的基本情况	(50)
表 3—1	牧民一年的生产生活周期	(82)
表 3—2	20 世纪 40—50 年代富蕴县哈萨克牧民的畜群结构	(84)
表 3—3	1952 年且柔奇部落牧主与牧工的经济关系	(89)
表 3—4	集体化时期五畜的功能	(93)
表 3—5	1952 年 7 个互助组农业生产情况	(103)
表 3—6	阔孜克村 21 户村民牲畜数量的变化 (2002—2012 年)	(117)
表 3—7	巴黑海儿子们的彩礼支出	(118)
表 4—1	盆地哈萨克人关于植物的本土描述	(138)
表 4—2	20 世纪 60—70 年代两间土坯房的木材需求	(156)
表 6—1	阔孜克村不同代际生育子女数与生育子女死亡数	(190)
表 6—2	游牧民人口转型过程中人口再生产模式之变化	(194)
表 6—3	20 世纪 50—80 年代阿勒泰地区医疗卫生条件的 变化	(216)
表 6—4	阔孜克村 20 户家庭两代人的分布与通婚范围	(223)
表 7—1	20 世纪 50 年代初哈萨克族家庭的人口规模	(239)
表 7—2	家庭人口规模与经济水平	(240)
表 7—3	1990 年吐尔洪盆地各村的人地比例	(245)
表 7—4	叶博提的包地情况	(257)
表 7—5	图四海一家一年的收支情况	(263)

第一章 导论：牧区社会与草原生态

萨伊（溪流）遍布着如金箭的细叶灌木。柔软的树枝被巧工们穹出毡房。一圈一圈，牧羊人像手镯的圆羔圈，专挑那镶满了翡翠的石头垒砌；春草满坡羊群闲游，马儿奔驰在绿茵的旷野。思念鲜草的驼群，走进灌木的山谷消失不见；石间小溪从峻峰跌下，汇集在宽谷流淌。埋头啃食的一群群牛，永远不会腻倦阿克塔勒（湖泊名）丰盛的水草；野草莓似红珠从陡山垂下，孩子们满山拾它忘了回家。卓勒萨伊的野黑加仑，似那羞涩少女回首窥看。高峰石林绝前路，风不侵林，深谷悠长。野猪狐狼天空还飞翔雄鹰，深山久居棕熊马鹿。红松直立似天柱，灌木嫩叶如稠丝。^①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一直以来，人们对游牧有两种“看似相悖，实则相近”的想象，要么“野蛮”“落后”，要么“自由”“无拘无束”。这两种想象无疑比

^① 这是当地最著名的“阿肯”朱麦海写的长诗《我的伊甸园，我的吐尔洪》的一部分。朱麦海，男，54岁，哈萨克族。此诗写于2010年，主要是为了追忆已经消逝的盆地曾经“绿色如绸带”的美景。这一首诗是笔者于2013年2月6日在吉格里拜村调查时获得。手稿是哈萨克语，笔者于2013年2月7日到富蕴县，委托学生博拉提翻译成了汉文。博拉提亦是一位年轻的阿肯，擅长写哈萨克长诗。翻译时，博拉提尽可能保留了原诗的韵律和哈萨克人的叙事方式。“阿肯”是哈萨克语“aken”的音译，意为“诗人”。普遍认为阿肯包括诗人、歌手、说书人和即兴演唱者。即兴吟诗、演唱叙事长诗（包括史诗）和与其他阿肯对唱是阿肯最重要的才能。参见莱再提·克里木别克《新疆哈萨克族阿肯弹唱的形式、内容和保护》，《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人类学中高贵的野蛮人”更为久远。^① 站在定居者和农耕民的角度来看，游牧是一种相对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些想象固化了游牧落后的形象，也主导了国家对游牧民或游牧社会的发展政策。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游牧社会普遍经历了以定居和农业为主要形式的有组织社会文化变迁运动，旨在“以定居让牧民不再移动，以农业改造牧业”，深刻地改变了草原地区的历史、社会与生态过程。

阿尔泰山这座庞大山系，被认为是游牧文明重要的发祥地，孕育了斯基泰、匈奴、柔然、鲜卑、突厥、蒙古等享誉世界的游牧族群。20 世纪 50 年代后，定居和农业逐步在该地区推进。作为阿尔泰山南麓少有的水土资源条件较好、适宜农耕的春秋牧场，吐尔洪盆地被选为新疆阿勒泰地区最早的定居点之一，大力发展农业。自从“大跃进”时起，盆地内喧嚣的人群就用各种“原始”的工具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向绿色如绸带的草原“进军”。人们收起了毡房，舍弃了畜群，住进了暖房，挥起了手中的犁耙，过上了先辈们不曾享受的“定居农业生活”。世代游牧的哈萨克人如何接受并实践着农业的生计方式与定居的生活方式？

这些变化诱发了牧民与草原资源关系的变化。为解决牧民无种植经验的问题，一批回族与汉族移民被有组织地引入盆地，成为农耕技术的推广者。这样的安排带来了预期的效果，牧民被转化为专业化的农业生产者，盆地成了远近闻名的“粮仓”。牧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口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又反过来对其与草原资源的关系产生影响。定居改善了牧区医疗卫生条件，降低了牧民人口的死亡率，使盆地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维持着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模式，人地关系很快失衡。定居改善了牧区生活、居住和交通条件，也加大了牧民在燃料和建材等方面的需求，人与森林的关系也很快失衡。市场经济带来了新变化，过去人们以资源满足生产生活需求，现在人们以资源求“发展”。

人与资源关系的变化最终在生态环境的变化上显现出来，主要表现

^① Anatoly M. Khazanov,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Second Edition), Translated by Julia Crookende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4, p. 1.

为草原的严重退化。茂密的山林、鲜嫩的牧草、清澈的流水、甘甜的泉水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连片的麦田、稀疏的山林、干涸的泉眼和断流的溪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本无缺水之忧的良田化为旱地，仰仗融雪浇灌的旱地变身荒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每年5月和7月融雪引发的季节性洪水夹杂着碎石和泥沙呼啸而下，冲毁草场、耕地和桥梁，填埋水库和水渠。进入21世纪，干旱持续加剧，牧民经历了7次严重旱灾。旱灾吞噬了粮食和牲畜，使得村民的生活举步维艰。面对旱灾，村民们茫然而不知所措。在老人们的记忆中，只有白灾（雪灾）能带来如此的重创，而在面对黑灾（旱灾）时只需通过更频繁的移动就可化解。毋庸讳言，生态退化导致了盆地社会脆弱性的增强与经济边缘化的加剧。^①三者相互强化，构建了盆地可持续发展的困局。

在草原地区，吐尔洪盆地的故事绝非孤例。已有研究揭示出，种植业发展引发了草原地区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格局的深刻变化，并进一步导致草原生态环境的退化。^②这些变化反映了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体系中草原地区和游牧社会被边缘化的命运和无法自主发展方向的现实，揭示出外在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力量的巨大影响。这些变化也受到了游牧社会内部经济、社会与文化及其变迁的影响。牧民在面对内外世界的变化时，也绝非被动，而是以情境为中心采取决策和行为，也对草原地区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格局产生影响。在这些力量的影响

① 社会脆弱性是指生计受到灾害和环境风险冲击和压力时，受害者应对能力的大小，由个人和集体脆弱性以及公共政策所决定。可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带有损害力的事件对于个人或群体生计的干扰后果，即风险暴露程度；二是个人或群体适应和应对这些变化的效果，即应对能力（参见张倩《牧民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脆弱性——以内蒙古荒漠草原的一个嘎查为例》，《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6期）。脆弱性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根源，严重制约了地方社区与人群的发展。有学者将社会脆弱性定义为“双重暴露”，即全球政治和经济变化与气候风险相互作用，同时影响着特定人群的生计和发展计划（参见王晓毅等《气候变化与社会适应：基于内蒙古草原牧区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这会产生严重的经济后果，表现为社区生产力发展受阻、生产边际效益递减和贫困加剧，即经济边缘化。Paul Robbins, *Political Ecology: Critical Introductions Geography*,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pp. 76-77.

② [澳] Colin G. Brown、Scott A. Waldron、John W. Longworth：《中国西部草原可持续发展研究：管理牧区人口、草场和牲畜系统》，赵玉田、王欧主译，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6页。

下，游牧社会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关系表现出了复杂性和动态性，总是处在不断变化和调整的过程之中。

笔者的关注点就是这个不断变化与调整的过程，以及游牧社会转型与草原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笔者将吐尔洪盆地当作大社会中的“地方世界”，认为它的故事可以折射中国草原地区和牧区社会过去几十年的沧桑巨变，有助于探讨如下一些问题：游牧社会转型与草原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呈现出何种演变轨迹？过去几十年，哈萨克人的资源管理制度、组织形式、利用行为和环境观念发生了哪些显著变化？这些变化与国家在草原地区推行的制度、政策和选择的发展路径，及其与外部世界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有着哪些联系？这些变化与哈萨克人社会结构、文化体系和人口结构的变迁存在着何种关联？这些变化对该地区的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格局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哈萨克人如何看待并应对这些变化，如何摆脱生态环境退化与社会脆弱性增强的双重困境？如何重塑草原地区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格局，并在草原地区重建生态文明？

第二节 学术史的回顾

王明珂指出“20 世纪以来的整体人类学中，游牧社会研究从未得到主流地位，它只是被视为一种研究‘田野’，而非人类学的一个分支”。^① 在游牧世界社会经济变迁与战乱动荡中，人类学家正在失去这一“田野”，游牧社会的研究似乎已日薄西山。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糟糕。首先，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知识谱系，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对由定居引发的游牧社会变迁之研究成果尤为丰富。游牧社会的族群研究、社会记忆、历史人类学、边界与边界跨越等议题仍是当代人类学研究的重大议题。^② 其次，中国的游牧社会正经历着“有组织社会变迁”和定居后“再社会化”过程，不仅引

^① 王明珂：《游牧对当代社会的启示》，载王明珂《父亲那场永不停息的战争》，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0 页。

^② 同上。

一 游牧社会及其变迁的人类学研究

(一) 国外研究

① 崔延虎：《游牧民定居的再社会化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③ 分枝性社会结构 (Segmentary Structure) 是游牧社会普遍持有的社会结构类型, 是一种层层由小而大的社会集群, 一种非经常性的“社会结构”, 因应对外来敌对力量的大小而临时凝聚为小或大的群体。通常表现为家族、氏族与各层级部落的聚合与分化。在哈萨克族社会中表现为阿乌尔、氏族、小部落、大部落、部落联盟、部兹的逐级聚合。王明河:《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54—55 页。

⑤ Fredrik Barth,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of Ethnic Groups in Swat, North Pakist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58, No. 6, 1956.

5

(主要是定居农业族群)关系的研究中,揭示出生态环境、经济生产模式与社会政治结构在游牧民社会结构和族群关系形成与维系中的功能。拉达·D. 哈德森和内维尔·D. 哈德森指出:“到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对游牧社会的研究都受到了功能主义的主宰——强调地方系统的边界和稳定性,这意味着对游牧社会的描述总是试图重构传统的社会组织。”^①此类研究主要的问题在于忽略了外部经济、社会、政治条件、族群关系和历史过程对游牧社会之影响,导致不可能对游牧社会正在发生的变迁展开深入研究。

在游牧社会的研究中,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作为人类学传统研究对象的游牧社会发生了深刻变迁,表现为传统游牧体系的衰落,社会文化的巨变,以及游牧社会更深度地嵌人民族国家体系和世界体系之中。人类学家意识到游牧社会是区域和国家系统的一部分,强调农业社会、国家或殖民机构对游牧民生存空间与社会行为的影响,出现了两种趋势。

第一种趋势强调游牧社会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在哈扎诺夫看来,游牧经济本质上是非自足的,必须与外在世界保持各种关系以获得重要资源。^②萨尔兹曼在1973年就指出“部落民、农民和城市居民不能作为一个自在的分析单位。每个群体的适应和经济体系都是与一个社会内其他社区密切关系的结果。对游牧社会的研究必须将之置于与农业社会、城市社会、国家体系和市场经济体系背景中进行分析”。^③他发现,萨尔哈迪的俾路支游牧部落被纳入国家体系后,游牧民被禁止抢劫农业村落,取而代之的是政府通过机械化的灌溉工程和各种扶持政策鼓励游牧民转向定居农业。^④

第二种趋势则关注国内政治进程对游牧社会的影响,尤其强调民族

① Rada Dyson-Hudson and Neville Dyson-Hudson, “Nomadic Pastoralism”,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9, 1980.

② Anatoly M. Khazanov,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Second Editi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4.

③ Salzman, P. C., “The study of ‘complex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 a Review Essay”, *Int. J. Middle East Stud.*, Vol. 9, 1978, pp. 539–557.

④ Philip Car Salzman,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Baluchi Tribe Leader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4, No. 4, 1973.

国家政治进程在游牧社会变迁中的作用。^①这一趋势延续至今，主要围绕国家直接或间接干预游牧社会，以及国家引导游牧社会实现“发展”的努力展开分析。比如，索马里政府1975年的土地改革使国内的牧民失去了占有土地和水资源的权利，导致游牧业的再生产无法维系、环境退化和地区冲突等棘手问题；^②国家也通过间接的发展政策、市场经济体系来推动游牧社会的变迁；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项目导致秘鲁安第斯山高地牧业社区更多地卷入市场经济之中，并逐步被转化为农民社区；在农民社区中出现了新的劳务工资关系、社会内部分化加剧和生计多元化等现象。^③人类学家发现，世界范围内的游牧社会都经历了农业扩张至干旱区持续加剧的影响，城市移民和牧民定居的影响，以及深度参与到市场经济——包括产品大规模售出和劳动力无产阶级化——的影响。这些进程在类型上各不相同，但又彼此联系，对牧民有着各种不同的影响。^④因此，在玛莎曼迪与巴斯·萨拉姆看来，二战后游牧业与其说是一种经济适应，还不如说是一种政治适应——解决游牧业存在问题的方式与其说是经济的，还不如说是政治的。如贝都因人都已定居，但变迁的动力既来自经济力量，也有来自政府的政策。但不管是哪种力量，都表明国家在游牧社会中权力的增大。^⑤

在国外游牧社会的研究中，也有一部分与阿尔泰山游牧社会相关。其中一部分文献涉及了哈萨克社会，但主要来自在现哈萨克斯坦地区所做的研究，仅有少量研究涉及中国境内的哈萨克族。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关注哈萨克族生计与社会结构，而对当代哈萨克族社会的研究比较少。

① Elliot Fratkin, "Pastoralism: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Issu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6, 1997.

② Unruh, John 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genous Pastoralist Resource Tenure and State Tenure in Somalia", *Geo Journal*, Vol. 36, No. 1, 1995.

③ Julio C. Postigo & Kenneth R. Young & Kelley A. Crews,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 Pastoralist Community in the High Peruvian Andes", *Human Ecology*, Vol. 36, 2008.

④ Elliot Fratkin, "Pastoralism: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Issu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6, 1997.

⑤ Gideon Kressel, "The Transformation of Nomadic Society in the Arab East",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5, No. 4, 2003.

1938年,阿尔弗雷德·汉德森的著作《哈萨克的社会结构》问世。书中的资料来自1936年7—10月期间他在现哈萨克斯坦所做的田野调查,主要是对俄国征服中亚前(19世纪中期)哈萨克族社会结构所做的研究,较为翔实地记录和梳理了哈萨克族的部落氏族制度、婚姻家庭制度和社会分工。他还对蒙古的社会结构做了研究,涉及部落氏族制度、婚姻家庭制度、内部社会关系等。通过比较,他认为哈萨克社会结构受到了蒙古社会结构的影响。^①显然,汉德森希望通过社会结构的研究和比较回答哈萨克社会如何组织和运行的问题,这与功能主义传统并无差别。该书存在田野资料和描述不够系统和精细的问题,但却非常重要,不仅提供了20世纪前哈萨克人和蒙古人社会组织的民族志材料,还成为欧美人类学欧亚草原游牧社会较早的研究成果之一。

对哈萨克族生计与社会结构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来自劳伦斯·克劳德。他在1955年发表的文章《亚洲草原游牧民社会组织的原则》中对亚洲草原游牧民的社会结构做了分析,认为生活在这片区域的各个游牧社会在生活环境、生计方式、移动方式上都相近,形成了一种以父系血缘关系和具有政治功能的社会结构。^②同年,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亚游牧社会的生态环境》中进一步指出:卡尔梅克、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中亚游牧社会的生计、生活方式、畜群与人群结构、移动方式等都是与环境相适应的,并且各要素之间,以及这些要素与环境之间形成了较强的功能关系。^③1963年他出版了《蒙古—突厥游牧民的社会组织》一书,对中亚游牧族群的社会结构做了更为详尽的分析。如他对哈萨克族的部落制度——玉兹、大部落、小部落、氏族、阿乌尔——做了非常清晰的梳理,对传统哈萨克族婚姻家庭制度和习惯法也做了详细记录。^④克劳德是欧美学界早期哈萨克社会研究的集大成者,其成果是研究该区域游牧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此类研究也见

① Alfred E. Hudson, *Kazak Social Struc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8.

② Lawrence Krader, "Ecology of Central Asian Pastoralism",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Vol. 11, No. 4, 1955.

③ Lawrence Krader, "Principles and Structure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Asiatic Steppe-Pastoralists",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Vol. 11, No. 2, 1955.

④ Laurence Krader,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Turkic Pastoral Nomads*, The Hague: Mouton, 1963.